

杨问春 张自强 施汉如 著

江海风情

张自强



JIANGHAI FENGQING

大众文艺出版社

江海風情

杨问春 张自强 施汉如

编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江海风情/杨问春等编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1999. 10

ISBN 7-80094-840-4

I. 江…

II. 杨…

III. 风俗习惯—江苏—南通市

IV. K89 2.45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9) 第 70575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 100021

国营如皋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75 字数 277 千字

1999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江苏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册

定 价: 19.00 元

刘
锡
诚

序

民俗是文化。有人群生存的地方，就有民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民俗既是共时的，具有传播性，又是历时的，具有传承性。人类文化史证明了，企图用老殖民主义者的残酷手段消灭或中断一个被占领民族或国家的民俗，或企图用某种超革命的手段，如我国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所用过的那些手段，消灭一个民族或地区源远流长的民俗传统，都是徒劳的。任何民族或族群的民俗，一旦产生，就以其固有的惰性，按照自己的内部规律传承着，延续着，发展着，变化着。随着时代的变迁，部分民俗事象是要消失的。一些失去效应的民俗事象消失了，另一些新的富于生命力的民俗事象又随之出现了。民俗生生不息。国际民俗学界一度把民俗的发生和存在仅限于农民社会，现在看来，这样的概念未免过于狭窄了。事实上，无论是人类文明初期的城市，或是中世纪出现的现代城市里，同样也有自己的民俗。民俗这种文化现象，无所不在地伴随着人类社会的生存。

对民俗事象的记述，即民俗志，在我国有着相当久远的历史，前人积累了极为丰富的资料。但现代意义上的民俗学的建立，则是 20 世纪初叶的事。19 世纪西方民俗学某些学说的成就引起了我国人文学者的兴趣，他们将其学说和方法引渡进来，初创了我国现代民俗学。但整个 20 世纪上半叶，对中国民俗学来说，也仅仅是初创而已，数量不多的我国民俗学家们不仅没有能够积累下系统完整的田野调查民俗资料，甚至连研究方法也没有较大的开拓与创新，因而民俗学的建设远远谈不上完善。20 世纪下半叶，前 30 年，国家处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民俗学被认定为资产阶级科学而无人敢于问津，长期处于停顿状态。当 1976 年 10 月“文革”结束，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民俗学才获得了新生，开始从冬眠中复苏过来，并逐步过渡到发展阶段。这一过程，屈指算来，还不到 20 年的时间。仅仅这短短 20 年中，我国民俗学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收获，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欣闻国家学位委员会已将民俗学定位为 2 级学科，这无疑也是对当前民俗学发展现状的一种评价。

杨问春、张自强、施汉如君，身处我国第一批沿海开放城市南通市文化战线的“三驾马车”，在 12 年前便开始加入到民俗研究的行列里来，着手研究地处“江尾海端”的民俗文化了。他们陆续在《民间文学论坛》、《民俗》、《民俗曲艺》等境内外报刊上发表他们的研究论文，现在他们把这些文章结集为《江海风情》；此外，80 年代以来，在他们的组织下，还多次把南通的传统民俗艺术和当代民俗艺术拿到首都北京来展览，使“江尾海端”的民俗艺术在京都文化界发生过相当广泛的影响。

他们在这部著作中所涉笔的“江尾海端”，是一个位于长江入海口北侧的特殊地区。其文化积淀最为古老的，有海安县沙冈乡青墩村的新石器文化遗址，距今 5000 年。至于今南通市所在地的古胡逗洲，在千年之前的唐代，各地“流人”就已开始在此“煮

盐为业”，“启吾东疆”了。这一地域，向东，是浩瀚的大海和沿海而居的古东夷族群；向南，长江彼岸便是吴越古文化区域；向北，与齐鲁文化区域相毗邻；向西北，便是古楚和中原之地。五方杂处的居民，带来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民俗生活，从而形成了“江尾海端”的特殊形态的民俗文化。在这“江尾海端”地区特殊形态的民俗文化中，既有吴越和荆楚文化中特有的淫祀的影响，也有东夷信仰的遗绪和齐鲁文化的理性文化的浸润。说出这一地域的特殊性，我想，他们著作的意义就是不言自明的了。

他们的研究所及，包括生产（稻作、渔猎、舟车、茶作），生活（服饰、饮食），人生（婚丧嫁娶、生育礼仪），信仰（驱邪逐疫仪式、乡雉、童子、庙会、葫芦），文艺（歌谣、俚曲、舞蹈、梨园、风筝）等广泛的民俗领域。他们著作的特点是，遵循了“实证”的原则，即不作空洞的高论，而让材料说话。据我所知，他们较多地利用了他们世居当地从小就对当地民俗耳熟能详的便当条件，也利用了一些间接的材料，但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若干问题上他们曾经进行过田野调查，他们从调查中取得了新鲜的第一手资料。

近年来，我在许多场合都强调过“实证”的原则。民俗学是一门实证性很强的学科，它要求研究者深入到他所研究的地区和族群，作第一手的田野调查，取得翔实可靠的资料，然后将这些资料进行历史的、功能的、比较的、甚至是跨学科的分析研究，对彼此孤立的民俗事象作出文化的阐释。几年前，有相当影响的美国当代民俗学家阿兰·邓迪斯在《世界民俗学》一书的中文版序言中曾说：“我还希望中国的民俗学家不仅进行搜集和分类，而且进一步对民俗作出分析和解释。……我认为，民间（Folk）概念在农民和无产者以外的扩展，以及与此有关部门的研究——历史的、功能的、结构的、符号学的、比较的或心理分析的研究，将是下一代中国民俗学家努力的目标。”（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0 年）我引

用邓迪斯先生这段话，并不是说他们三位已经无可挑剔地做到了这些要求。但我认为，他的话是值得我们下一代民俗学家们玩味和实践的。

与杨问春、张自强、施汉如相识整整 15 个年头了。前些年常常见面，近年除了问春外，我们都已离职在家休息了，各人都没有放弃民俗学的研究，但见面的机会毕竟是减少了。日前，张自强老大哥行色匆匆地自南携稿来京，要我为他们的著作写序，我为他们在民俗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和鼓舞，并借此机会向他们这部著作的出版表示祝贺。上面这些话，就作为这本专著的序言吧。

1998 年 4 月 13 日于北京安外寓所

杨问春

自序

南通，地处江苏东部，长江北侧，在万里大江的入海口与大都会上海隔水相望、互成犄角。它既是历史悠久的苏中文化名城，又是我国首批对外开放的沿海城市之一。历史与现实，古老与当代，在这江海大地兼收并蓄、交汇互存，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江海风情。

我和我的两位研究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老朋友张自强先生、施汉如先生早就有心编写一本系统介绍南通地方风土人情的专书，并早已动笔。无奈各自都有本职工作，只能利用业余时间断断续续写些零星文章，见发于境内外报刊。前几年，两位老兄先后离（退）休，唯我依然囿于俗务，难得清闲。然而，我等都已垂垂老矣，光阴荏苒，时不我待，若不抓紧，恐成后憾。于是老骥奋蹄，何待鞭催，长夜孤灯，怎敢有懈？又以一年时间校订旧稿，另撰新篇，遂使书稿告成。倘从第一篇文章发表算起，其间跨度竟达 12 年之久。“人生易老天难老”，信哉斯言！

南通是我们的家乡。这里山青水秀，物阜民丰，人文荟萃，文化淀积十分深厚。我等生于斯、长于斯，对其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充满感情。我们三人中，予生虽晚，但在这方热土上也已生活了将近一个花甲轮回。人生怀旧，老来弥坚，何况是对于生我养我的衣胞之地。鉴于此，我等总觉得有责任、有义务把家乡的历史人文、民间的风情习俗、祖辈的艰难困苦以及我们几十年来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悟，原原本本地告诉年轻的读者，好让他们对自己的家乡有一个比较完整、更为清晰的了解，并立志为建设新南通、创造美好未来而发奋图强。

南通建城已有千余年历史。先前，则是孤悬于江口海域的沙洲。史籍载：“（洲）上多流人，煮盐为业”（《太平寰宇记》）。后来，江海横流、沧桑巨变，这里成了祖国东疆的一块新生陆地，至今它还在不断地向东延伸。而我们的祖先们正是凭藉着开拓者那种大无畏的精神和气魄，“辟我草莱”、“启吾东疆”，在这江海之滨驾舟捕鱼、垒灶烧盐、垦荒种地，终于把一个原本麋鹿驰奔、鸢鸥栖飞、荒无人烟的江滩海涂改造、建设成良田万顷、物产丰富、人口密集、经济繁荣的发达地区。其原因除天时、地利外，人和是最为重要的因素。南通地方勤劳善良的民情、淳朴敦厚的民风，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又一笔宝贵财富。

本书涉猎内容包括民间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岁时节令、宗教信仰、传统文化等各方面的民情民俗。在记述旧时习俗的同时，我们一方面对某些民俗的生成和传承作了必要的、力所能及的理论分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另一方面对民俗中的那些陈规陋俗和封建迷信的恶风邪习进行了比较深刻的抨击和批判，并指出它定将消亡或遭到摒弃的必然性。观今鉴古，批判接受，移风易俗，破旧立新，这是当今民俗学研究的主题，也是我们编写此书的宗旨。

编写过程中，得到许多专家、学者和朋友们的支持、鼓励与

帮助，同时还吸收借鉴了南通地方专攻文史和民俗学的前辈及友人们的研究成果，在此一并深表我们的衷心感激之情。

1997年10月于望塔楼

目 录

序.....	刘锡诚 (1)
自 序.....	杨问春 (5)
饭稻羹鱼写食俗	(1)
棉乡布都谈服饰	(21)
江委海端话民居	(42)
水复路重志舟车	(61)
万苦千辛记稻作	(83)
品幽尝绿讲茶经	(96)
说古道今识板鹞.....	(115)
轶事旧闻忆梨园.....	(133)
俚词乡曲唱风情.....	(148)
风调雨顺颂太平.....	(164)
新风旧俗说过年.....	(179)
四时八节叙风习.....	(191)

生儿育女总关情·····	(211)
男婚女嫁多陋俗·····	(223)
寿山福海夸民风·····	(242)
破旧立新言丧葬·····	(250)
纳吉布福赞葫芦·····	(269)
驱疫逐邪论庙会·····	(278)
锣随鼓隶证乡傩·····	(299)
后 记·····	(329)

饭稻羹鱼写食俗

饮食乃人类生存之大要。古人云：“民以食为天”（《汉书·酈食其传》），可见它在人们生活中所占地位至关重要。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里，有着大量关于饮食文化、饮食习俗的记载。《博物志·五方人民》说：“东南之人食水产，西北之人食陆畜。食水产者，龟蛤螺蚌以为珍味，不觉其腥臊也。食陆畜者，狸兔鼠雀以为珍味，不觉其膻也。”《史记·货殖列传》载：“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水耨，果臝蠃蛤，不待贾而足；地执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皆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汉书·地理志》曰：“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臝蠃蛤，食物常足……不忧冻饿。”《盐铁论·论菑篇》则云：“越人美蠃蚌为简大牢。”《越绝书》“卷三”也谈到越人习于水居生活，好吃腥味食物。这些古籍所论述的饮食习俗，与地处江海之滨，古属吴越之地的南通人民的饮食习惯及风俗语多相合。

南通位于长江入海口北侧，濒江临海，民阜物丰，是著名的“崇川福地”、鱼米之乡。万里大江呼啸西来，又奔腾东去，“每年挟带高达四亿吨以上的泥沙”^①。到了下游，江面宽阔，水势渐缓，泥沙沉淀，日积月累，在江海会合处形成的片片沙洲，“皆入江涨沙而成”。其中“胡逗洲”即今南通发祥地。其时，“江淮千里绝无人烟，春燕巢林木”^②。唐代，这里成了流放犯人的所在，“多流人，煮盐为业”^③。斗转星移，沧海桑田，自唐以后，沙洲与陆地相连，古南通州成了著名的盐场，来自各地的“流人”则成了南通的先民之一。他们“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荒滩草丛，有猎不完的飞禽走兽；江海河塘，有取不尽的水产海鲜。南通的先民们，在这块得天独厚的大地上生活，既食“水产”，又食“陆畜”。《博物志》中所谓的“东南之人”、“西北之人”视为“珍味”的食俗，南通兼而有之。更为难得的是，南通气候温和，雨水充沛，河网纵横，土地肥沃，适宜多种农作物的生长，一年两熟，夏秋有收，稻麦瓜豆，应有尽有。淡水、海水两大类水产品种齐全，资源丰富。渔盐农畜四业兴盛，人们“饭稻羹鱼”，也称得上是“食物常足”、“不忧冻饿”了。

“五方杂处”的古南通州，其食俗明显地受到了东南、西北和中原各地的影响，是比较复杂和典型的多食俗地区。笔者认为，深入研究南通先民及现代南通人的饮食沿革、传承和习俗，对全面了解这一地区的历史、生产、民生和民俗的发展、变化，均有十分重要的科研和现实意义。

南通地处江尾海端，地连南北，溯江而西可达内陆诸省，历史上为各地“流人”五方杂处之地。这里自然条件优越，食物来源充足，基本上可以满足“流人”们的生活需求和饮食习惯。虽然我们今天已无法重现历史，但现今是历史的延续。从考古研究

和对今人饮食习俗细微、周密观察、分析中，我们仍不难窥探到先民们的食俗大概，发现它与现代南通人饮食的传承关系。

南通市所属海安县青墩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挖掘，不仅表明南通西北部早在五千多年以前，便已有了人类的活动和文明；而且从出土的大量麋鹿牛羊猪骨、谷粒和柴草灰烬中，可以获知当时青墩人的饮食概貌。

然而，青墩人只是广义上的，而不是狭义上的“南通人”的祖先。作为最先来到“胡逗洲”上“煮盐为业”的“流人”，作为当今操南通方言的南通人的初民，他们所生活的沙洲，四遭环水，孤悬海天，赖以生存的除了携带谷种，开荒垦地，种植五谷，充当主食外，恐怕就只有依靠捕捞“鱼虾螺蚌”和猎取“狐兔獐鹿”来补充食品了。

《临海水土记》载：“夷州在临海东南，去郡二千里……土地饶沃，既生五谷，又多鱼肉……取生鱼肉杂贮大器中，以卤之，历日月而啖食之，以为上肴……”这种普遍流传于东南“蛮夷”居地的、以盐渍腌制鱼肉的风俗，在濒临黄海、盐产富甲的南通，更是盛行久远，传沿至今。

古胡逗洲和海门岛以东的土地，成陆时间较晚，原先乃浅海沙洲或海滨滩涂，经历年围垦而成良田。乡民多数自江南和崇明岛迁徙而来，也有部分来自长江上、中游，操吴语启海方言（即“崇明话”），其生活习惯与饮食习俗与土生土长的南通人多有差异。

这一切，正是构成南通食俗古老、复杂和多样化的历史和地理原因。

与全国大多数地区一样，南通人的主食是粮食（水稻、三麦及其它杂粮）。由于南通是长江冲积平原，海岸东移，地势西高东低。人们依据各地的地理、土质、水源等自然条件因地制宜耕作种植。如皋市西乡是“高沙土”，蓄水性能较差，适宜种植耐干旱

作物，如玉米、高粱、山芋等。海安、如皋两县东部，海门、通州两市西部以及南通市郊，均以稻麦为主。如东、海门、通州、启东县（市）东部，原系沿海滩涂，地含盐碱，开垦后很适合棉花生长，是我国著名的棉区之一，换茬种粮以三麦、玉米居多。

南通人口稠密，地少人多，据 1988 年统计，一市六县（市）人均耕地仅 0.98 亩。农民们精耕细作，惜土如金，粮食总产量为 296 万吨，单产高于全国水平。然而一来由于人多地少，二来因为这里是主要的棉花、黄麻、薄荷、留兰香等经济作物产区，必然压缩粮食种植面积。所以，长久以来，南通城镇居民主要依靠吃外地调运的大米，而农村日常主食历来是“种啥吃啥”。

从历史上看，南通人特别是广大农民，主粮是大米和三麦。南通人民所谓的“三麦”，系指小麦、大麦、元麦。一个地区三种麦类都种，在其它地方似不多见。特别是元麦，外地一般很少种植。过去南通农村，不太愿意种植小麦，究其原因有二：一是南通人民不似北方那样嗜好面食；二是小麦病虫害多，管理麻烦，且成熟较迟，影响水稻的蒔插。每当夏收夏种之时，小麦登场，稻田耕蒔，农人们辛苦万分，难以兼顾，弄不好还会贻误农时、减产减收。所以，南通农家宁可多种元麦、大麦，而不愿种植小麦。近十多年来，随着农业科技事业的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饮食结构的改变，大量引进抗病虫、抗倒伏、早熟高产的小麦良种，农村小麦播种面积现已大大超过大麦和元麦。

过去南通乡间，农民生活艰苦，秋熟稻谷、棉花多用于交租纳粮，全家一年的口粮主要依赖大麦、元麦和其它杂粮。如东、如皋、海安一带，将大麦（或玉米）磨碎，用以煮饭烧粥，俗称“糝儿饭”、“糝儿粥”。市郊、通州市人将元麦磨碎，俗称“覈子”，启海人则呼之为“麦栖”。南通人凡中年以上者，无有不知覈子为何物的。其实，覈子并不好吃，特别是“光覈子”饭（粥），一般人恐怕很难下咽。请看下面两首民歌。

东山日出向上来，
親子薄粥盛了两春台；
想吃你就喝上两三碗，
要吃白米秋上你再来。

姐儿吃饭面朝北，
顿顿吃饭顿顿哭。
亲娘问她什侬事？
“五忙六月喝薄粥，
一碗薄粥喝到底，
三粒親子两粒米。”

古老的民歌，绘声绘色地反映了往昔农家饮食的艰苦。

每当夏收之际，元麦最先登场。“麦场”上槌枷挥舞，黄金飞溅，脱粒后晒干颋净，挑至磨坊磨成粳子，并从中筛取“元面”。元面可擀成粗面条（俗称“元面条儿”），也可加酒酵蒸馒头（俗称“元面馒头”）。元面呈黄黑色，质地粗糙，口感甚差。但其时正当春荒之际，农家缺粮日久，元面便成为大忙时节的上好食品。小麦成熟晚，最后登场。从前农家节俭，加工面粉时，不分“头面”、“二面”，从头磨到底，中间不过筛，图的是少出麸皮。这种面粉谓“混合面”，俗称“一条龙”。因其色黄，故又称“黄面”。唯有家里女人“做月子”（生小孩）或富裕之家，才吩咐磨坊主人多留麸皮，磨制白面。一般人家只在小麦归仓后才能吃上一顿面条或干面烧饼。自此以后，除非家中来了至亲好友，擀面条招待，平时桌上很难见到这种“高档”白面食品。

南通地区水稻有秈、粳、糯三种，另有一种“旱稻”，生长在旱田旁边，不需灌水，因其产量太低，人们很少种植。“旱稻米”煮饭，有一种特殊的诱人香味。物稀为贵，颇受珍重，可惜现在已很难寻觅了。南通城内，市民爱吃饭米（粳米）；而海安人过去